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10期
ISSN: 3079-4420

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就业率的动态冲击与区域分异

王家豪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中国

【摘要】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升级使得中国面临的贸易不确定性（TPU）显著上升，其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21—2025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区域两个层面，系统考察了TPU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TPU对就业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滞后效应，冲击响应在第四至第六期达到峰值；在控制相关变量后，TPU指数与就业率呈现正向统计关联，这一发现可由稳就业对冲、企业预防性储备劳动力以及国内市场承接效应等机制加以解释；区域比较表明，东部地区就业对进口开放度和TPU的响应最为敏感，中部地区就业更多受到出口开放度与技术创新的驱动，西部地区受外部贸易冲击的影响相对有限。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从制度性开放、金融支持、产业链韧性和就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提出差异化的建议。

【关键词】贸易不确定性；就业率；VAR模型；OLS回归；区域异质性

1.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必须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以下简称TPU）已成为影响各国经济运行与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外生因素。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多次加征关税，且关税调整的时间节点、覆盖范围和持续期限均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通过贸易渠道向国内经济传导，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投资行为乃至用工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5年第四条磋商报告中明确指出，关税上升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预计将拖累中国出口，并对就业水平产生不利影响[2]。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机制与传导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涉及多条传导路径。沉没成本理论指出，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需要承担不可逆的固定成本，当贸易政策前景不明朗时，企业往往倾向于采取观望态度，推迟投资和雇佣决策，由此产生等待期权效应[3]。不完全契约理论则认为，由于交易双方无法在合约中穷尽所有未来可能的情形，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加剧合约执行的困难，增加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跨国贸易合作与企业的用工安排[4]。已有文献在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抑制进出口、干扰货币政策实施、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以及阻碍全球价值链合作等渠道对一国的就业产生影响[5]。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展开了大量研究。在贸易领域，Handley和Limao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中国加入WTO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显著促进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增长和社会福利改善[6]。隋建利等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时变效应具有长短期差异，企业家信心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传导作用[7]。在就业领域，毛其淋和许家云利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总体上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8]。陈虹和徐阳则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雇佣行为的促进效应[9]。然而，现有文献中直接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变量、系统考察其对中国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不同于已有文献多聚焦于微观企业层面或单一行业的做法，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系统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

国就业的整体影响；其二，本文将 VAR 模型与 OLS 回归相结合，既能捕捉变量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和脉冲响应特征，又能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静态回归效应；其三，本文将全国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为差异化的区域就业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就业的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两个经典理论框架。一是沉没成本理论。Dixit 在 1989 年的经典研究中指出，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必须承担不可逆的前期投入，包括市场开拓、渠道建设和品牌推广等方面的成本[10]。当贸易政策的未来走向不明确时，这些沉没成本的存在会使企业对扩大生产和增加雇员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具体而言，面对可能出现的关税调整或贸易壁垒变化，企业会将延迟投资和雇佣视为一种保有等待期权的理性策略，只有当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降低到一定阈值以下时，企业才会实施扩张性的经营决策。这一机制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劳动力需求，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Bloom 等的研究也证实，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企业推迟投资和雇佣决策，进而对总体就业产生抑制效应[11]。

二是不完全契约理论。Hart 和 Moore 的经典文献指出，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签约双方无法在合约中对未来所有可能的状态做出完备的约定[12]。在国际贸易语境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意味着合约执行环境的恶化，交易双方面临更大的违约风险和再谈判成本。当一国的贸易政策频繁调整或缺乏可预期性时，上下游企业之间、国内企业与外商之间的合作关系都将受到负面冲击，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减少，国内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劳动力需求也将随之收缩[13]。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条渠道实现传导。

在进出口贸易渠道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直接抑制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政策制定者对关税、配额和补贴等工具的调整具有时间、幅度和方向上的不确定性，这会使出口企业难以准确预判未来的市场前景，进而推迟或缩减其生产和销售计划，导致出口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与此同时，进口贸易也会受到波及，进口成本的不确定性增大使得依赖进口中间品的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并可能传导至下游产业的就业岗位。隋建利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时变效应，且长短期影响存在差异[14]。

在企业成本渠道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从多个维度推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关税政策的频繁调整增加了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采购成本，企业还需要投入额外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跟踪和应对政策变化，这些管理成本和合规成本的上升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葛新宇等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传导至银行体系，使得银行业的整体风险水平上升，企业融资环境也随之恶化[15]。在成本压力和融资约束的双重夹击下，企业往往被迫压缩生产规模或采取裁员措施。

在投资决策渠道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和投资者的预期来改变投资行为。当政策前景不明朗时，企业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判断更加困难，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企业往往选择推迟固定资产投资和产能扩张计划，由此带来的投资增速放缓会直接减少新增就业岗位的供给。冀志斌等的研究证实，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的实体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16]。此外，郭平和胡君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制造业领域外资新企业的进入数量与规模，从而间接影响了相关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17]。

在全球价值链渠道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通过干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协作来影响就业。当前，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大量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取竞争优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可能导致跨国公司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布局，加速产业链转移或近岸外包趋势，这将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产生冲击，进而影响相关环节的就业。卞元超和白俊红的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技术复杂度，不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18]。

2.3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学界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最具影响力的测度方法包括：Baker 等提出的基于报纸文本分析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19]，Handley 和 Limao 提出的基于约束关税与实际关税差异的关税测度法[20]，以及基于非关税壁垒变动的识别方法[21]。其中，关税测度法因其量化精度较高而在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在构建省级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时，主要参考了 Handley 和 Limao 的关税测度法框架，并借鉴 Potlogea 和 Cheng 的方法[22]，以各省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处理，从而得到能够反映各省差异化特征的 TPU 指数。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宏观经济和行业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 GDP 增长、进出口规模和就业等指标均会产生显著影响。Caldara 等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发现，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导致投资下降、就业减少和价格上涨[23]。Pierce 和 Schott 的研究揭示了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后，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24]。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俞会新和薛敬孝较早地发现中国加入 WTO 所伴随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工业就业产生了积极效应[25]。盛斌和牛蕊则从劳动力需求弹性的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贸易开放对中国工业就业风险的影响[26]。

行业层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就业效应的认识。郑华峰等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或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时，更为显著地加剧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的经营风险[27]。屠心祎等从医药行业的视角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促使药企加大研发投入，但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金融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表现较弱[28]。这些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综合以上分析，尽管现有文献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和经济效应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区域就业格局的研究仍显不足。中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效应在不同区域理应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 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滞后性。由于政策从出台到落地再到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需要经历一定的传导时滞，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率的冲击效应可能不会在当期立即显现，而是在若干期后逐步达到峰值。

假设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东、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受 TPU 冲击较大；中部地区处于承东启西的过渡地带，受出口导向型因素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西部内陆地区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就业受到的波及程度可能较小。

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就业现状分析

3.1 我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单边到多边的深刻转型。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入世后中国大幅降低关税水平、放宽市场准入限制、逐步开放服务业领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中国又先后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一系列区域贸易安排，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然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国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以 Huang 和 Luk 构建的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参照，该指数在 2008—2015 年间总体处于低位震荡区间，自 2016 年起逐渐回升，2017—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期间出现显著跳升，并于 2019 年达到样本期内的峰值[29]。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后，严格的管制措施和需求下降使 TPU 指数有所回落，但其绝对水平仍显著高于历史均值，且自 2022 年以来在地缘政治紧张和供应链重构等因素的扰动下持续保持高位波动。与此同时，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统计，全球对华贸易救济案件数自入世以来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20 年达到 131 起的历史峰值，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所处外部贸易环境复杂程度的加深。

3.2 我国就业的总体格局与区域特征

中国拥有超过八亿的就业人口，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市场之一。近年来，中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也面临一系列结构性挑战。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逐步减弱，而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新就业形态则日益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与此同时，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青年就业压力有所加剧；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就业差距虽然在政策引导下有所收窄，但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长期是中国经济和就业的传统核心区域，该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最为紧密，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外向型经济，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较强，对贸易政策变化的敏感度也相对更高。中部地区近年来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就业规模保持增长，产业结构呈现出由传统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渡性特征。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投资拉动和资源开发，就业格局对外部贸易冲击的敏感性相对较弱。这种区域异质性为后文的分区域实证分析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贸易政策与就业的关联性来看，二者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双向互动关系。贸易政策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进而传导至劳动力市场：降低关税和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能够促进出口增长和外商投资流入，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之，贸易保护措施和反倾销调查则可能导致部分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规模收缩和就业岗位减少。就业形势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贸易政策的取向，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市场承压时，政策制定部门往往会出台更为积极的外贸支持政策以稳定就业。

4.实证分析

4.1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就业率（Y），以各省级地区年就业人数占年总人口的比重进行度量。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采用关税测度法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量化，并参考Potlogea和Cheng的方法[30]，以各省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为权重构建省级层面的TPU指数。控制变量的选取综合考虑了贸易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两个维度：出口开放度（Export）和进口开放度（Import）分别以各省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占该省GDP的比重度量，用以刻画对外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K）反映投资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效应；就业人员平均工资（Wage）用以控制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符合古典经济学中工资与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技术创新（Innovation）以各省专利授权数度量，借鉴了刘军等的研究方法[31]。

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5）、《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2025）以及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和经管之家数据库。样本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2025年的面板数据。各变量在回归之前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异方差性。变量名称、含义及代表符号如表1所示。

表 1.变量名称及符号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代表符号
被解释变量	就业率	Y
解释变量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ln X_6$
	出口开放度	$\ln X_1$
	进口开放度	$\ln X_4$
	固定资产投资	$\ln X_3$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ln X_2$
	专利授权数	$\ln X_5$

本文首先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就业之间的整体动态关系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begin{pmatrix} Y_t \\ lnX_{1t} \\ lnX_{2t} \\ lnX_{3t} \\ lnX_{4t} \\ lnX_{5t} \\ lnX_{6t} \end{pmatrix} = \alpha_0 + A_1 \begin{pmatrix} Y_t \\ lnX_{1t-1} \\ lnX_{2t-1} \\ lnX_{3t-1} \\ lnX_{4t-1} \\ lnX_{5t-1} \\ lnX_{6t-1} \end{pmatrix} + \cdots\cdots\cdots A_k \begin{pmatrix} Y_t \\ lnX_{1t-k} \\ lnX_{2t-k} \\ lnX_{3t-k} \\ lnX_{4t-k} \\ lnX_{5t-k} \\ lnX_{6t-k} \end{pmatrix} + \varepsilon_{i,\ t} \cdots\cdots \quad (1)$$

4.2 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方差来看，各变量的波动幅度总体适中，其中出口开放度和进口

开放度的方差相对较大，反映了不同省份间对外贸易规模的显著差异。就业率的均值为0.1276，标准差为0.0571，表明样本期内各省就业率水平存在一定的离散程度。

表 2.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	偏度	峰度
Y	0.1276	0.1115	0.3738	0.0722	0.0571	2.6039	10.2594
lnX1	-2.5631	-2.5401	-0.7573	-5.5019	1.0257	-0.3735	2.8076
lnX2	11.3525	11.3122	12.1790	10.9241	0.2415	1.1649	4.5756
lnX3	9.6905	9.8488	11.0459	7.5603	0.9170	-0.4843	2.2183
lnX4	-2.7158	-2.7628	-0.3491	-5.6406	1.1322	-0.1878	3.0336
lnX5	10.6101	10.7445	13.6789	6.0403	1.4319	-0.5069	3.3567
lnX6	3.8309	3.9362	5.9309	0.9879	0.9382	-0.7165	3.5549

在进行 VAR 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变量的 ADF 检验统计量均小于 5%临界值（-2.93），P 值均为 0.0000，表明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具有平稳性。因此，全部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4.3VAR 模型估计与脉冲响应分析

表 3.VAR 模型最优阶数检测结果

Lag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393.7802	NA	4.60e-07	5.273424	5.412681	5.329995
1	142.7579	1016.598	7.54e-10	-1.141551	-0.027490*	-0.688980*
2	211.5149	123.9436	5.83e-10	-1.401512	0.687353	-0.552942
3	296.1459	144.7636*	3.69e-10*	-1.870341*	1.193327	-0.625772

由表 3 可知，基于 AIC、SC 和 HQ 信息准则的综合判断，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确定为 3 阶。最终得到 VAR 模型如下：

Y=0.7246*Y(-1)+0.0147*Y(-2)-0.0716*Y(-3)+0.0032
*LNX1(-1)-0.0026*LNX1（-2）-0.0056*LNX1（-3）+0.0104*LNX2（-1）+0.025
*LNX2（-2）-0.0246*LNX2（-3）-0.0027*LNX3（-1）+0.0037*LNX3（-2）-0.0048
*LNX3（-3）-0.0015*LNX4（-1）+0.0039*LNX4（-2）+0.0048*LNX4（-3）+0.0024
*LNX5（-1）-0.0066*LNX5（-2）+0.0051*LNX5（-3）+0.0019*LNX6（-1）+0.0071
*LNX6（-2）-0.0051*LNX6（-3）-0.065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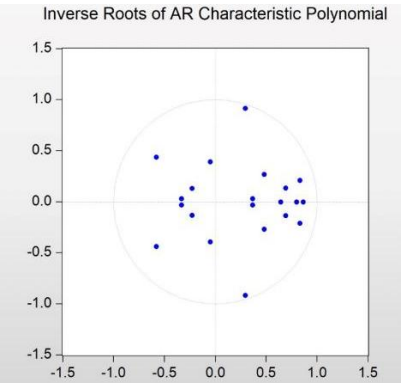


图 1.AR 根检验图

对 VAR 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检验结果如下图 1，可以看出，所有的单位根的模大于 1，因此该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从图 1 的单位根图中也可以看出，逆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内，表示模型稳定。

Granger 因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如表 4 所示，就业人员平均工资（lnX2）、专利授权数（lnX5）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nX6）是就业率（Y）的 Granger 原因，其中 lnX2 和 lnX6 的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29.95 和 85.67，P 值均为 0.0000，在 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而出口开放度（lnX1）、固定资产投资（lnX3）和进口开放度（lnX4）对就业率的 Granger 因果关系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动态系统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和领先效应。

表 4.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

原假设	统计量	自由度	P 值
X1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9.25	3	0.4592
X2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29.95	3	0.0000***
X3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3.35	3	0.3409
X4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0.59	3	0.8987
X5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7.48	3	0.0581*
X6 不能 Granger 引起 Y	85.67	3	0.0000***

注：***、*分别表示在 1%和 10%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在 VAR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广义脉冲响应分析，重点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率的动态冲击效应。如图 2 可知，给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一个正向标准差冲击后，就业率的响应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U 型轨迹。具体而言，冲击效应在初期较小，随后逐渐增强，在第四期达到较大值，随后有所回落并在第六期达到响应的峰值，此后逐渐收敛至零。这一结果为假设 1 提供了实证支持，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并非即时性的，而是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特征。从经济含义来看，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冲击首先作用于企业的预期和决策层面，然后逐步传导至生产经营环节，最终反映到劳动力需求和就业岗位的变化上，这一传导过程需要四到六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充分释放其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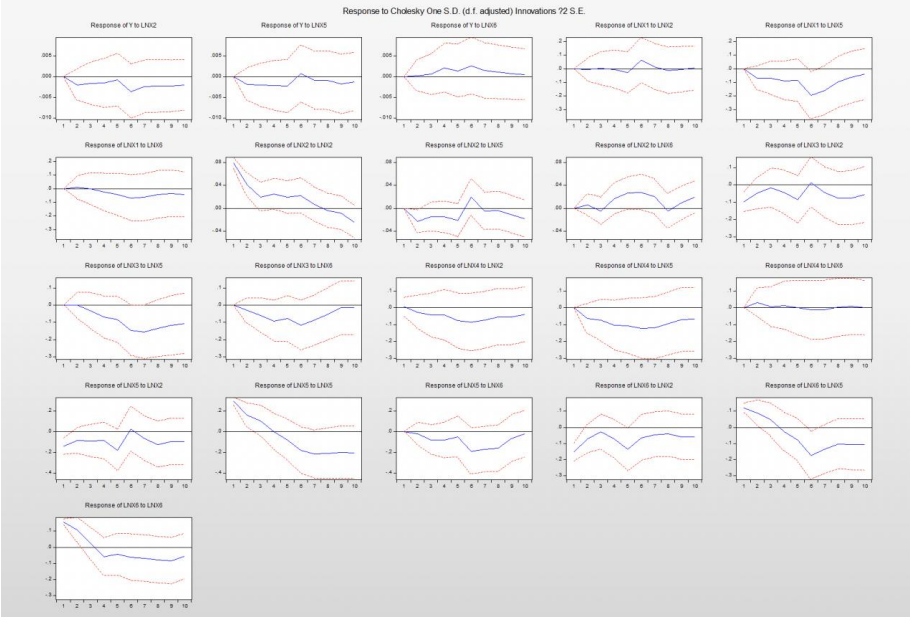


图 2.脉冲相应分析

4.4 整体及分区域 OLS 回归分析

4.4.1 全国整体 OLS 回归结果

对全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 OLS 回归模型：

$$Y=\alpha_i+\alpha_1 LnX1_{i,\ t}+\alpha_2 LnX2_{i,\ t}+\alpha_3 LnX3_{i,\ t}+\alpha_4 LnX4_{i,\ t}+\alpha_5 Ln53_{i,\ t}+\alpha_6 LnX6_{i,\ t}+\varepsilon_{i,\ t}\quad (i=1，2…31,t=2021，2022…2025) \qquad (3)$$

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从回归系数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nX6）的系数为 0.0250，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期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上升与就业率之间存在正向的统计关联。就业人员平均工资（lnX2）的系数为 0.1111，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可能反映了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活跃度和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同效应。进口开放度（lnX4）的系数为 0.0176，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口开放度的提升有助于就业率的提高，这与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产业链的正向带动效应相一致。固定资产投资（lnX3）的系数为-0.0313，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看似反直觉的结果可能与投资结构有关，资本密集型投资的增加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的效应。出口开放度（lnX1）和专利授权数（lnX5）的系数均不显著。

表 5.整体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显著性
C	-0.9136	0.0000	***
lnX1	-0.0005	0.9904	
lnX2	0.1111	0.0000	***
lnX3	-0.0313	0.0000	***
lnX4	0.0176	0.0000	***
lnX5	0.0033	0.4969	
lnX6	0.0250	0.0000	***

注：***表示在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4.2 东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分析后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河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和海南省确定为东部地区，其东部地区 OLS 回归公式如下：

$$Y=\alpha_i+\alpha_1 LnX1_{i,\ t}+\alpha_2 LnX2_{i,\ t}+\alpha_3 LnX3_{i,\ t}+\alpha_4 LnX4_{i,\ t}+\alpha_5 Ln53_{i,\ t}+\alpha_6 LnX6_{i,\ t}+\varepsilon_{i,\ t}\quad (i=1，2…11,t=2021，2022…2025) \qquad (4)$$

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较高，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呈

现出与全国层面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特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nX6）的系数为0.023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全国层面的结果方向一致，但系数略小。就业人员平均工资（lnX2）的系数为0.115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程度与全国水平接近。值得关注的是，进口开放度（lnX4）的系数为0.071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影响幅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符合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进口贸易主要集散地的现实特征，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充足供给对维持该区域的产业运转和就业稳定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出口开放度（lnX1）的系数为-0.0155，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反映了出口导向型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时压缩劳动力成本的行为。固定资产投资和专利授权数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6.东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显著性
C	-1.0787	0.0010	***
lnX1	-0.0155	0.0504	*
lnX2	0.1153	0.0001	***
lnX3	0.0089	0.4917	
lnX4	0.0713	0.0000	***
lnX5	-0.0151	0.1521	
lnX6	0.0237	0.0054	***

注：***、*分别表示在1%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4.3 中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本文将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以及北至山西、南至湖南、江西的区域，其中部地区 OLS 回归公式如下：

$$Y=\alpha_i+\alpha_1 LnX1_{i,\ t}+\alpha_2 LnX2_{i,\ t}+\alpha_3 LnX3_{i,\ t}+\alpha_4 LnX4_{i,\ t}+\alpha_5 Ln53_{i,\ t}+\alpha_6 LnX6_{i,\ t}+\varepsilon_{i,\ t}\ (i=1，2…8,t=2021，2022…2025)\ （5）$$

表 7.中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显著性
C	0.3293	0.0487	**
lnX1	-0.0103	0.0338	**
lnX2	-0.0174	0.2481	
lnX3	-0.0215	0.0000	***
lnX4	-0.0080	0.1478	
lnX5	0.0116	0.0091	***
lnX6	0.0020	0.5505	

注：***、**分别表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变量显著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开放度（lnX1）的系数为-0.0103，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中部地区，出口开放度与就业率之间同样存在负向关系，这可能与中部地区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初级加工品为主、附加值较低、对就业的带动效应有限有关。固定资产投资（lnX3）的系数为-0.0215，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延续了全国层面资本替代劳动的特征。专利授权数（lnX5）的系数为 0.011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技术创新对中部地区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与中部地区近年来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nX6）的系数虽为正向但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就业对贸易政策波动的敏感性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4.4.4 西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将除以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部省分划分为西部区域，其西部地区 OLS 回归公式如下：

$$Y=\alpha_i+\alpha_1 LnX1_{i,\ t}+\alpha_2 LnX2_{i,\ t}+\alpha_3 LnX3_{i,\ t}+\alpha_4 LnX4_{i,\ t}+\alpha_5 Ln53_{i,\ t}+\alpha_6 LnX6_{i,\ t}+\varepsilon_{i,\ t}\ (i=1，2\ 12，t=2021，2022…2025)\ （6）$$

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相对较低，大部分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仅出口开放度（lnX1）的系数为 0.0081，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就业受对外贸易因素的影响较为有限，该区域的就业状况更多地取决于区域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和政策环境等因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lnX6）的系数为 0.0035，P 值为 0.5201，远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进一步印证了西部地区就业对贸易政策波动冲击的免疫特征。

表 8.西部地区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P 值	显著性
C	0.1839	0.3108	
lnX1	0.0081	0.0343	**
lnX2	0.0022	0.8839	
lnX3	-0.0097	0.1567	
lnX4	-0.0006	0.8859	
lnX5	0.0008	0.9837	
lnX6	0.0035	0.5201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5 实证结果小结

综合 VAR 模型和 OLS 回归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主要发现。就假设 1 而言，脉冲响应分析清晰地显示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的滞后性特征，冲击效应在第四至第六年达到峰值，这一发现否定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及时的最初假设，揭

示了政策冲击在宏观经济系统中传导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假设 2 而言，分区域 OLS 回归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区域就业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的判断：东部地区就业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开放度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中部地区就业对出口开放度和技术创新更为敏感，西部地区就业则基本不受贸易政策波动的直接影响。这种区域异质性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差异密切相关。

5.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21—2025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 VAR 模型和 OLS 回归方法，从全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区域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就业率的影响并非即时产生，而是在冲击发生后的第四至第六年达到峰值。这一发现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评估贸易政策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时，必须充分考虑其滞后传导特征，避免因短期内影响不显著而忽视其潜在的中长期冲击，这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预期、投资决策与价值链调整等中介机制层层传导至劳动力需求的理论逻辑相吻合。

第二，从全国层面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进口开放度对就业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就业率的正向关联可由多重机制加以解释：一是稳就业政策的对冲效应，在不确定性上升期政府积极出台援企稳岗、扩大就业服务等政策，部分抵消了外部冲击的负向作用；二是企业基于预期的预防性劳动力储备动机，在订单波动加剧时倾向于通过保留员工以维持响应能力；三是贸易转向带来的国内市场承接效应，部分外向型产能转向国内市场后仍能吸纳一定就业。进口开放度的正向作用则与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对国内产业链的正向带动效应一致，即充裕的进口资源供给有助于维持国内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用工需求。

第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域，其就业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进口开放度的影响最为敏感，这与该地区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导向型产业集中的特征相吻合。中部地区的就业更多受到出口开放度的负向影响和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驱动，反映了该区域产业结构承东启西的过渡性特征以及近年来技术升级对就业结构的重塑作用。西部地区由于外贸依存度较低、经济发展更多依赖内生动力，就业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直接冲击有限。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围绕“稳外贸”促进“稳就业”的核心逻辑，本文从制度性开放、金融支持、产业链韧性和就业结构优化四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这四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从外部环境塑造、企业资金保障、产业升级支撑与劳动力配置协同四个层面共同构成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政策合力。

5.2.1 深化国际合作，以制度性开放降低外部不确定性

外部环境的稳定是“稳外贸”乃至“稳就业”的重要前提。鉴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四到六年的滞后期，政策制定者在出台贸易相关举措时应更加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频繁政策调整对企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造成叠加冲击。在多边层面，应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构建更加透明、可预期的全球贸易治理框架，以减轻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在区域层面，应加快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签署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充分发挥 RCEP 等区域贸易安排的制度红利，通过制度性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承诺锚定贸易伙伴的政策预期，降低单边贸易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双边层面，应鼓励有条件的外贸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施境外投资与本地化经营，以分散单一市场和单一政策环境的风险，同时拉动国内母公司相关业务和就业的协同增长。

5.2.2 完善金融支持体系，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企业融资约束渠道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缓解融资压力是稳就业政策的关键发力点。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金融机构应主动设计针对外贸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专项信贷产品，通过降低利率、延长期限、放宽抵押要求等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减轻其在外部冲击下的资金压力。在传统信贷之外，应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等多元化金融工具，

帮助企业盘活应收账款和库存等流动性资产，缓解短期资金紧张。鼓励金融科技在信贷审批中的应用，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审贷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使中小企业更有效地获得金融支持。同时，应建立健全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对承担相应风险的金融机构给予适度财政补偿，以激励金融体系将更多信贷资源配置到有就业贡献的实体部门。

5.2.3 推动价值链升级，提升企业就业质量

价值链升级不仅有助于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就业的直接冲击，还能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引导企业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是推动外贸稳定与就业增长的长期战略。一方面，应通过税收优惠、研发补贴和首台套保险等政策工具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生产工艺升级和产品质量提升，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应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推动以智能制造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的技术更新，使企业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模式转向以技术、品牌与服务为核心的差异化竞争，这一转型过程客观上会推动就业岗位由低技能向高技能迁移，需要配套的劳动力培训与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支持。中部地区的实证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对就业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表明对中西部地区而言，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与本地技术升级相结合，有望走出一条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张同步推进的发展路径。

5.2.4 优化就业结构，促进劳动力技能转型与区域协调

研究发现的区域异质性意味着稳就业政策必须坚持“一区一策”的差异化思路，而非“一刀切”的统一安排。对于东部沿海地区，鉴于其就业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最为显著，应着力引导外贸企业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增强供应链韧性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进口端继续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降低关键中间品和零部件的交易成本，确保产业链稳定运转和就业岗位的持续供给。对于中部地区，应加大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使劳动力素质与产业升级需要相匹配。对于西部地区，虽然就业受贸易政策波动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仍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和发展特色产业等途径增强区域经济的内生发展动力，并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等措施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就业差距。在劳动力市场层面，应建立健全就业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密切跟踪贸易政策变化对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就业的影响，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加强面向新兴产业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适应产业结构变革带来的就业岗位转换需求。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受样本数据可得性与研究篇幅所限，本文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拓展。其一，样本时间跨度相对较短，2021—2025 年的数据虽能反映近年来贸易摩擦持续期内的就业格局，但难以充分捕捉中长周期的结构性变化，未来若延长样本期至贸易摩擦发生前后的对比阶段，有望更清晰地识别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影响机制。其二，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层级，虽能揭示宏观区域格局，但难以深入挖掘行业与企业层面的微观异质性，后续研究可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或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主体视角验证与补充本文的发现。其三，本文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采用以就业人数为权重的加权方法，未来可尝试将关税测度法、文本分析法和非关税壁垒识别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以提升测度的精确性与全面性。

参考文献

[1]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olligo P et al.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20,109:38-59.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IMF 发布格林纳达 2025 年第四条磋商总结声明》；访问时间 2026 年 4 月 20 日；https://gd.mofcom.gov.cn/scdy/art/2025/art_f193017557274f3d88e0aa1f58d6b616.html。

[3] Dixit A.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3): 620-638.

[4] Hart O, Moore J.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Econometrica, 1988, 56(4): 755-785.

[5] 葛新宇，庄嘉莉，刘岩.贸易政策不确定

性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对企业经营渠道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21（8）：133-151.
[6] Handley K, Limao N.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 2731-2783.
[7] 隋建利，张龙，申瑛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进出口时变效应研究——兼论企业家信心的传导路径.国际金融研究，2023（2）：3-13.
[8] 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微观证据.经济研究，2016，51（1）：69-83.
[9] 陈虹，徐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就业人数吗——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企业微观数据.宏观经济研究，2018（10）：121-133.
[10]Dixit A.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97(3): 620-638.
[11]Bloom N, Bond S. Van Reenen J.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Dyna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2): 391-415.
[12]Hart O, Moore J.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Econometrica, 1988, 56(4): 755-785.
[13]郭平，胡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3（2）：34-49.
[14]隋建利，张龙，申瑛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进出口时变效应研究——兼论企业家信心的传导路径.国际金融研究，2023（2）：3-13.
[15]葛新宇，庄嘉莉，刘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对企业经营渠道的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21（8）：133-151.
[16]冀志斌，叶耐德，陈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实体投资.国际金融研究，2021（9）：3-13.
[17]郭平，胡君.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世界经济研究，2023（2）：34-49.
[18]卞元超，白俊红.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了企业的技术复杂度?国际金融研究，2022（9）：25-34.
[19]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20]Handley K, Limao N.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5, 7(4): 1-39.
[21]Bown C. P, Tovar P. Trade Liberalization, Antidumping, and Safeguards: Evidence from India's Tariff Refor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1): 115-125.
[22]Potlogea A, Cheng W.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Working Paper, 2017.
[23]Caldara D, Iacoviello M, Molligo P et al.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0, 109: 38-59.
[24]Pierce J. R, 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1632-1662.
[25]俞会新，薛敬孝.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世界经济，2002（10）：10-13.
[26]盛斌，牛蕊.贸易、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风险：中国工业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6）：3-15.
[27]郑华峰，何海燕，孙磊华，常晓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科技和产业，2023，23（1）：1-6.
[28]屠心祎，金千，苏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医药企业研发关系研究.商业会计，2022（5）：32-36.
[29]Huang Y, Luk P.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59: 101-367.
[30]Potlogea A, Cheng W.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R]. Working Paper, 2017.
[31]刘军，杨浩昌，崔维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1）：132-147.